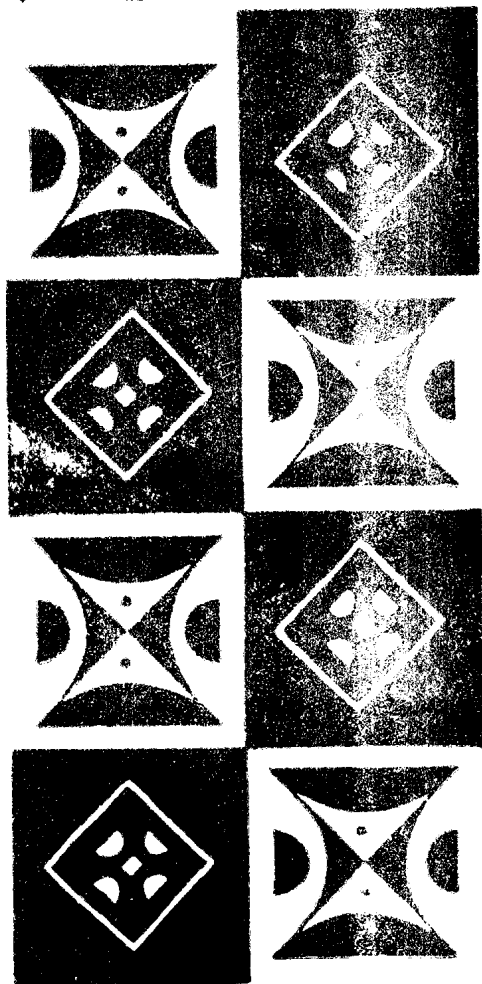




王中青

赵树理作品论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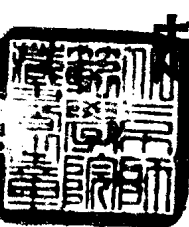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07177

王 中 青



赵树理作品论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

1107177

赵树理作品论集

王 中 青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字数: 187千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1800册

*

书号: 10397·120 定价: 1.85元

.....

目 录

谈《三里湾》.....	1
关于《灵泉洞》.....	55
简谈赵树理的几个短篇小说.....	84
用艺术的武器推动现实的工作	
——重读《“锻炼锻炼”》.....	93
重读《实干家潘永福》.....	98
《互作鉴定》读后感.....	108
《邪不压正》的艺术.....	111
重新认识《卖烟叶》.....	116
赵树理之死.....	125
太行人民的儿子.....	163
旧戏改革的先声	
——评《邶宫图》.....	168
谈谈《打倒汉奸》.....	177
话剧民族化大众化的可喜步伐	
——评《两个世界》.....	182

评《万象楼》	192
论《三关排宴》	202
论《石不烂赶车》	217
谈谈《开渠》	239
后记	250

谈《三里湾》

在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的时候，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地开展起来了。广大的农民群众，特别是贫农、下中农的革命积极性已经显明地表现出来了。他们那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意志和那种移山倒海、翻天覆地的革命力量，已经显露得很清楚。大量的英雄人物已经一批一批地涌现出来了，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热情地和广大农民群众在一起，正在不断地创造着壮丽动人的新的诗篇。《三里湾》就是反映这一斗争的一个比较优秀的成果。

我记得是在一九五四年夏天的时候，赵树理同志给我谈了他写《三里湾》的计划和《三里湾》的故事梗概。当时，我认为要把他所计划写的故事充分展开，至少得写三十万字。可是当他在九月底让我看他的原稿的时候，却不过十五万字。我以先睹为快的心情，一气把它读完了。它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我认为这是一部比较成功的作品。他的这部作品无论从思想性和艺术性哪一方面来说，都比他以前所写的作品有了更大的提高和更大的成功。首先是 he 在这部作品中突出地揭示了他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这就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他在表现这个主题思想的时候，不仅通过秋收、整党、计划开渠等一系列的具体事实，有力地说明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发展的规律性与不可抗

拒性，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的优越性，而且将反对封建家庭、封建陋习的斗争与两条道路的斗争很好地结合起来了。其次，通过故事的展开，他成功地创造了范登高、“糊涂涂”、“常有理”、马有翼、王满喜、范灵芝、王玉梅、王玉生等几个典型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对于新生一代人物的塑造，比他以前所写的“小字辈”人物有了显著的成功。作品的结构布局都比较严谨，伏笔、扣子，有许多颇费匠心之处。我为他的这种新的成就而欢快。但是这部作品也还存在着某些缺点：政策思想有不够完整，主题思想有不够明确之处；故事没有多方面地展开，而且收缩太快；在表现手法上，用侧面描写的地方多了些。这是我初读《三里湾》的粗浅印象。

《三里湾》出版之后，销行很广，工厂、农村的基层干部，扫盲后的工人、农民，高小毕业生、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机关干部，都有许多人喜欢这部作品。文艺界和许多党政负责同志，对这部作品也有很好的评价。这又引起我再读的兴趣。当我再读、三读之后，可以说我对《三里湾》的领会更多了些。我曾以《谈赵树理的〈三里湾〉》为题，写过一篇文章，以后又修改过一次，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次就原来所谈的问题，作了再一次的修改和充实。如有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

一、关于《三里湾》的时代背景与主题思想

1. 时代背景

《三里湾》的时代背景，正是全国农民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积极试行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的时候。这个时

候农民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互助合作的积极性都是很高的。他们一方面积极生产，另一方面积极参加互助合作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参加临时互助组与常年互助组的农民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山西省绝大部分地区是抗日根据地的老区，在这些地区，实行互助合作的历史是较久的。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三年冬陕甘宁边区召开的劳动英雄会议上所说的，合作社“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困变富裕的必由之路”^①，群众对这句话是记忆犹新的。因此，他们新的历史条件下，试行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的积极性是更高的，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也是较快的。一九五一年春开始试办第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一九五二年秋初，组织起来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五点五，其中虽然绝大多数是互助组，但全省已建立起五百六十六个初级农业社，每个县都已有了二、三个社，少数县已达到区、区有社。初级社的发展已开始形成高潮了。赵树理同志所最熟悉的长治地区，一九五一年就试办了初级社，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初级社的发展也较快。特别是在党中央于一九五三年先后公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的两次决议之后，这个地区的互助合作化运动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更加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以武乡县与平顺县为例，一九五三年，武乡县入社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一，平顺县已占百分之十一（当时全省参加初级社的农户仅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一·六）。赵树理同志所写的《三里湾》，就是以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二年秋天，长治地区试办第一批和第二批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的情况作为题材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5页。

互助合作化运动，这是我党领导农民在完成了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个革命（土地改革）之后，必须积极开展的第二个革命；这个革命牵动的范围和它的深度，要比第一个革命广泛得多，复杂得多。因为这个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一切剥削和最后的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在农村即为富农）；以农业合作化来代替农村中根深蒂固的个体经济，要按照社会主义的轨道来建设新的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并且要逐步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引导全体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我们不能设想象这样一种创造性的事业，象这样规模巨大的翻天覆地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会一帆风顺而不遇到什么抵抗和困难，相反地，困难是很多的，斗争是尖锐的。这种抵抗的力量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敌对的阶级，即来自地主、富农和农村中其他资本主义剥削分子；另一方面是来自农民（主要是富裕中农）本身的两重性所包含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和农民长期个体经营的习惯势力。这种抵抗力量既然在社会上存在，也就会经过各种形式反映到党内来，特别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思想情绪会反映到党内来。当山西省在1950到1951年这个时期内，提出了要不断地增长互助组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并且使互助组逐步过渡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农民中绝大多数贫雇农和下中农的态度是积极的，是欢迎的，但那些富农却在竭力进行抵抗和破坏（当时在一般老区新富农约占农户总数的千分之一左右，在一般晚解放区富农约占农户总数的千分之五左右）。那些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也在阻挠合作化运动的进展。当时农村中所严重存在着的“一碗水”思想，“发家到顶”的思想，早上一顿“金皇后”，中午一顿“一六九”，夜晚一个热炕头，还要抱个“剪发头”的思想，“四大自由”的思想，“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情况，

就是这种新富农和富裕中农的思想反映。他们说什么：“革命到顶了，用不着再实行互助合作农民也能发家致富。”“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就够了，再干社会主义革命就要贴老本了。”他们愿意单干，愿意买胶轮大车跑“运输”，愿意“搞副业生产”，愿意合股搞投机买卖，甚至有的人放高利贷。有些参加了互助组的，愿意在互助组阶段停下来，不愿参加初级社。他们之中有些人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很积极，对社会主义道路很抵触（当然，绝大多数人是不自觉的），虽然他们在经过合作化运动的影响、冲击，和对他们的批评、教育之后，是可以转变过来的，但当时他们还是抵触的。

这一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既尖锐，又复杂的。这是因为，第一，在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中，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任何增长，同时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被削弱，被排挤；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是欢欣鼓舞的，积极参加的，富农却是惶惶不可终日，深感自己的剥削生活日暮途穷，便想铤而走险，勾结地主分子、反动分子，采取一切手段来进行抵抗和破坏。同时，富农还在利用中农的动摇，向我们进行斗争。中农是一个不固定的阶层，特别是少数富裕中农；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而且有的还有轻微的剥削；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都有两重性。很明显，争取中农的斗争是我们和富农斗争的一个焦点。只有在把全部中农团结在我党周围，富农才会彻底地、最后地被完全孤立起来。第二，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是工人阶级在农村的支柱，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的核心力量，他们对于合作化运动积极支持，对于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热情拥护；但他们的革命热情一般还是朴素的，是以自己的一时的阶级利益要求出发的，他们的那种小生产者的散漫保守的弱点，仍然是存在

着的。小生产者的这种思想，也必然要在合作化过程中反映出来。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合作社本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反映，这些矛盾在初级社刚建立的时候，就显示出来了。这些矛盾虽然不是对抗性的矛盾，但它将是长期存在着的矛盾。所以，合作化的过程，就农民内部来说，也就是这种矛盾长期斗争的过程。以上这样两种性质的矛盾和斗争也必然会反映到党的内部来，首先是反映到农村基层党组织中来。那个时候，有不少农村党员在土地改革之后已经上升为富裕中农了。随着经济生活的上升，有些人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滋长起来了，和党的关系也逐渐疏远了。他们不仅不积极参加互助合作运动，而且有少数党员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下，已经蜕化变质了。甚至有个别党员已由消极而终于退出革命了。这种情况，实质上是富裕中农思想在我们党内的反映。

很明显，如果不在党内和群众中采取适当的方式，根据群众的切身遭遇与经验进行社会主义的教育，进行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互助合作运动是不可能顺利开展的。山西省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正是这样。每当在群众中深入地辩论一次，开展一次这样的教育和这样的思想斗争，互助合作运动就向前发展一步，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涌现一批。这便充分地证明了毛主席所说的“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要去占领”的真理是颠扑不破的。

2. 主题思想

赵树理同志在《三里湾》中，通过对秋收、扩社、整党、准备开渠等故事情节的生动而曲折的描写，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合作

化运动初期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情况，从而具体地说明了合作化运动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与不可抗拒性，说明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和它的发展的广阔前途，以及由于这种发展必将引起和已经引起的生产、生活方式、阶级关系与人们的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变化。也正是通过这种生动而曲折的描写，他一方面热情地歌颂了贫雇农、新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另一方面，他又以生动的笔触辛辣地揭露和批判了党内外具有资本主义思想倾向的人们。

《三里湾》这部作品，是把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显示出来的共同劳动、集体经营的优越性，与反映在思想领域中的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交织在一起，展开它的故事情节的。赵树理同志在安排这些故事情节的时候，以秋收、整党、扩社、准备开渠为内容，并且着力地描写了秋收丰产的情节，是具有深刻意义的。他一开始就写三里湾的人们忙于秋收准备。接着他又在“万宝全”、“不能只动一个人”、“船头起”、“老五园”、“黄沙沟口”、“站得高、看得遍”、“三个场上”等章节中，穿插地描述了三里湾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丰产的情况。对于这种丰收情况，他是这样描述的：“最明显的是社里的大场，一块就有邻近那些小场子的七八块大，谷垛子垛在一边象一堵墙”；原来小场的石碾不适用了，必须改良工具，把小场用的石碾子洗一下给大场用；魏占奎包工的四亩谷子，“在包工时候估是六十担”，结果超产了十八担；王兴老汉种的菜园，“一共廿亩还有二亩种的是谷子”，现在光种菜十八亩就能卖三千万元，粗说一亩园能顶十亩田；老五园的玉蜀黍长了一丈多高，“伸起手还探不着的玉蜀黍穗儿长得象一排一排的棒槌”；黄沙沟口的五亩沙地原来压在沙底，“每亩地只算了三斗产量，只能种大麻也长不好，现在

五亩地割了四十多担谷子”。通过这些描述，他把三里湾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丰收景象生动而有力地表现出来了，从而也就富有说服力地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共同劳动、集体经营中的优越性揭示出来了。他揭示出的优越性具体地表现在哪些方面呢？这就是：第一，合理地规划了土地，因地制宜地种植了各种农作物；第二，合理地使用了劳动力，有计划地实行了分工分业的劳动，并且发展了农、林、牧、副等各方面的生产；第三，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与可能，进行了许多农业技术改革、工具改革以及防沙、治沙等农业基本建设，这便大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生产力。三里湾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社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农业生产就获得了这样的丰收，这正是这些优越性开始显示了作用的结果。如果三里湾扩社、开渠等工作胜利完成之后，这种优越性的作用必将会更进一步地显示出来，农业劳动生产率必将更进一步地不断地提高，农、林、牧、副的生产必将大大发展，这是可以预卜的。

农民是“现实主义者”，只要能引导他们具体地看到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发展生产，能够丰收，多打粮、多收入、多得利，他们就能够从事实中认识到农业社的优越性，他们参加农业社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便会大大地发扬起来。赵树理同志在他的《三里湾》中选择了秋收的季节来展开他的故事情节，接着在上述的章节中又着力描写了农业社丰产的景况，他的用意就正在这里。

赵树理同志在表述三里湾农业生产合作社优越性的同时，又在“奇怪的笔记”、“这日子不能过了”、“拆不拆”、“治病竞赛”、“范登高的秘密”、“有没有面”、“小组里的大组员”……等章节的故事情节的描述中，揭露和批判了范登高、袁天成、马多寿这样三种类型的人，这是《三里湾》主题思想另一

个方面的表现。范登高，是土改时翻得高，在这个时候他又是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典型人物。这是具有企图向富农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是老党员又是村长，在群众中又是有一定影响的人，象他这样的人，已经成了建社、扩社的严重障碍。如不首先在党内认真而严肃地批判这种思想倾向，彻底纠正这种错误思想和行为，要想顺利地展开建社、扩社运动，领导群众迅速地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很困难的。袁天成是另一种类型。这是一般中农小私有者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参加了合作社又留下了许多自留地。这种人具有浓厚的私有观念，身在合作社，心在自留地。对自己的生产很积极，对合作社的生产不热心。这种个体经济的小私有者的思想和行为，对于建社与扩社也是不利的。当然，三里湾农业生产合作社要纠正这类思想观点，还有一个相当艰巨的过程。在批判范登高这种人的时候，有必要对袁天成这号人，也给以批评和教育。

“糊涂涂”马多寿又是一种类型。他是富裕中农的代表，具有比较严重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他羡慕范登高又想利用范登高，他参加了互助组，实际上他是在利用互助组。他对我党的各项政策向来是不满意的，是运用那种带有浓厚的封建的保守色彩的斗争方式和我们进行斗争的。在这个时候，他又在竭力地阻挠三里湾的扩社运动，维护他的既得利益，安于现状，企图在互助组阶段停下来。为了胜利地开展建社、扩社的运动，这种人的思想和行为同样是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的。

赵树理同志选择了这样三种典型作为他批评的对象，是有道理的，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互助组比单干好，它已孕育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因素，这是应该首先肯定的，但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尚未发生任何变化，如果不遵照党的合作化政策与农业社会

主义改造的政策不断地向前发展，它仍然存在着发生两极分化的危险。二、初级社比互助组发展了一步，但它仍是互助合作运动的一个过渡形式，它仍然必须由小到大，由低到高不断地巩固和发展。才能保证农业劳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农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改善。赵树理同志用老梁的三幅画说明三里湾的今天、明天和将来，就正是企图说明互助合作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性与不断革命的必然性的。因此，批判这样三种典型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不仅对于这些人是有很大教育意义的，是必要的，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教育广大农民群众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使他们能在划清两条道路的界线之后，坚决地参加到互助合作运动中来。当赵树理同志在批判上述三种人的时候，又塑造了王金生、张永清、张乐意、王玉生、王玉梅等一批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物，作为与上述三种人的对立面，这便更加鲜明地把发展初级社时期的两条道路斗争的基本情况展示在我们面前了。

当作者在表现这一主题思想的时候，同时还表现了另外一种斗争——反封建家庭、封建习俗的斗争。通过这一斗争，表述了他对于改造旧家庭建立新家庭的观点，和他关于青年一代的恋爱观点。虽然他在表述这些观点的时候，显露出作者主观的理想的色彩，虽然他所描写的恋爱似乎是缺乏恋爱生活的一种恋爱，但就他所反映出的客观现实生活来说，已经可以说明这样两个问题：一、当人们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他们仍然在完成民主革命阶段某些方面尚未完成任务，它虽然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副产物，但它却在丰富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二、民主和睦的家庭是新社会所需要的，也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旧家庭的改造和新家庭的建立，必然是伴随着社会的改造而逐步进行的。赵树理同志在他这部作品里不仅把当时合作化运动中的主要矛盾

（两条道路的斗争）与从属的、次要的矛盾（反封建的斗争）很好地结合起来了，而且是把这种矛盾斗争，通过秋收、整党、扩社、准备开渠等主要的故事情节和家庭纠纷、结婚、离婚等生活琐事曲折而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关于民主和睦的革命的新家庭，他写了王宝全一家。这是赵树理同志在《三里湾》中所写的四个家庭中最革命的一家。这是革命的、民主、平等、和睦的家庭，也是赵树理同志所积极提倡的一种新社会的新型家庭。他们一家人一心一意地跟着党走，拥护党的政策、党的领导。他们一家人之间都具有共同的工作、生产积极性，具有同样的新生活的兴趣。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和思想基础。劳动的家庭和新社会的道德风尚结合起来了。赵树理同志写这样一个家庭和马多寿、袁天成、范登高家对照，这在表现他的主题思想和他的对于家庭的观点说来是很有意义的。这样的家庭在老解放区是很多的。这样的家庭有极大的吸引力，范灵芝很愿意到王家去过日子，而对马多寿家则很厌恶，对她自己的家也很反感；她终于嫁给王玉生，这也是原因之一。菊英对王家更是羡慕，她在和金生媳妇诉苦的时候说：“大嫂呀！我看小俊也是放着福不会享！你们那家里不论什么时候都是一心一腹——也不论公公、婆婆、弟兄们、小姑子，忙起来大家忙，吃起来大家吃，穿起来大家穿，谁也不偏这个不为那个。在那样的家里活一辈子多么顺气呀！我这辈子不知道为什么偏逢上了这么一家人。”这样的家庭，在“能不够”这样的人看来，却是“乱糟糟”的，“不干正事”的，“不算个什么家”。正是这样家庭中的人物，象王金生、王玉生、王玉梅、王宝全等，是合作化运动胜利开展所依靠的社会基础和骨干力量。

与此相对照的，他写了另一种家庭，就是马多寿家。这是他

所批判的一种家庭。在赵树理同志的笔下，马家是个典型的封建落后家庭。他对于马家的关锁门户和马家的大黄狗咬人费了许多笔墨。他在描写到马家院的情况的时候，是这样写的：“只要天一黑，不论有几口人还没有回来，总是先把门搭子扣上，然后回来一个开一次，等到最后的一个回来以后负责开门的须得把上下两道拴关好，再上上碗口粗的腰拴，打上个象道士帽样子的木楔子，顶上个连梢突刨起来的顶门叉。又因为他们家里和外边往来不多——除了他们互助组的几户和袁天成家的人，别人一年半载也不到他家去一次，把个大黄狗养成了个古怪的脾气，特别好咬人——除见了互助组和袁天成家的人不咬外，可以说是见谁咬谁。”在以后的各节里，关于马家的人如何关门，开门，大黄狗如何先叫一阵，见了熟人就不叫了的描写还有几处。他还写了马家直到这时候还保存着许多封建陋规。这一方面的描写，我在后面人物分析一节将具体谈到，这里只想指出一点，即：马多寿们必然会成为三里湾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障碍，但这样的家庭，也必然要随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而发生变化。菊英分家和“有翼革命”，就是这种家庭的一种变化，马多寿终于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更是这种家庭的一种显著的变化，那种封建陋习也必然会随着这种变化而逐步地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是互助合作化运动促进了的，同时它又是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一致的。

从上面所作的《三里湾》主题思想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分析来看，我认为，赵树理同志在合作化初期，就能抓住这样一个重要的主题，而且比较成功地表现了这个主题，是十分值得赞许的。

但是，他在表现这个主题思想的时候，我认为还存在着某些缺点，具体表现在：